

科技“大跃进”运动评析

□ 崔禄春

“大跃进”运动是党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的一次严重失误。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科技事业也被带进“大跃进”的快车道,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科学、大闹技术革命,向科学的堡垒进军。实践证明,科技大跃进是党在探索中国式科技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教训极为深刻。

一、思想跃进是科技“大跃进”的前提

科技“大跃进”是在不断地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倡“红透专深”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58年2月,王应睐等17位上海科学家向中科院全部知识分子发出倡议:下决心做左派,争取在5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要步步向左,力求红透。各地纷纷响应这一倡议,预示着又一个思想改造高潮的到来。3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指出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必然继续。双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在知识界进行的双反斗争是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展开的。3月11日,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赵九章等19位科研人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致科学界同志们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思想跃进是科学跃进的前提,号召科学家努力改造,突破科学跃进第一关。同月13日,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也指出科学为大跃进服务的根本问题是加强科技队伍,而加强科技队伍的重要方法是整风,整风就是解决科学工作的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的社论。社论号召“一切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下定决心,经历这一场痛苦的但是最后会是精神爽快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孙悟空跳进老君炉去受锻炼的决心,

让群众双反运动猛烈的火焰,把自己烧个四十九天……烧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烧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1]。在中央号召下,科技界积极响应,开始了双反运动。

双反运动主要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的。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动员深入开展双反运动,进行大争大辩大整大改,要“兴无灭资”。清华大学开展了关于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批判科研脱离实际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其它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闻风而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在这种氛围下,科技界人士纷纷制定红专规划,提出业务与思想双双跃进。他们以红专问题为核心,进行了交心运动。交心运动要求科学家们走出个人的小圈子,互相见面,互相交心,当时被认为是改造思想的一种好方法。交心运动中的共同语言是:把心交给党,永远跟党走!学习政治,不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双反运动和交心运动的初衷是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科学事业的危害,确立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思想改造为科技大跃进奠定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把大多数知识分子看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在实际上都是用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法来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效果很不好。

思想改造性质的双反运动到后来演变成“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掉资产阶级白旗,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插满科学的各个领域。因此,学术批判的面相当宽。这一时期,除了重新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批判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外,批判范围大大扩展了。如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慎元是资产阶级思想,“皆伐”才是无产阶级的;批判果树栽培中的“疏花疏果”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等。当时较出名的“拔白旗”成

果是“拔掉”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齐民友提出了两个观点,即“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科学”,“数学不能联系实际”。这两个观点提出后,该系师生中有25%反对,25%赞成,其余动摇。“拔白旗”运动开始后,这两个观点被视为“白旗”。全系师生组织了40多个辩论团,用了20多天时间,开了100多次辩论会,自称“百团大战”,最后“终于粉碎了资产阶级观点,拔掉这一面资产阶级白旗。”对于这种错误的、过火的学术批判,说理少,扣帽子,用压力,使人不敢讲话,完全破坏了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科技“大跃进”的部署和表现

1958年2月中旬,中科院召开了研究所所长会议,对科学工作的“大跃进”进行部署。郭沫若院长在会上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使科学大跃进;并提出以“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实现规划”八句话作为促进科学“大跃进”的口号。3月12日,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作总结发言时提出:当前生产大跃进,迫切要求科学大跃进,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3月17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的“大跃进”》一文。这样,1958年二三月间,科技跃进的声势已经形成。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立即掀起了各方面大跃进的高潮。6月,科学院举行了跃进誓师大会,号召破除迷信英美的奴隶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向科学高峰的大进军。7月上旬,科学院举行了党代会,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了党领导科学跃进的五项原则: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走群众路线;组织科学工作大跃进;有节奏地组织跃进运动,一浪推一浪地前进。8月2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文章。至此,党的科技发展的跃进政策完全提出来了。

在跃进口号的感召下,科技界从领导到科学工作者,无不雄心勃勃。但是,一味追求速度、时间,科技工作也出现了浮夸。科技跃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科技领域的浮夸。从7月起,《人民日报》开辟了“努力攀上科技的高峰”的专栏,介绍科技跃进的成果,等于是放科技“卫星”。如报载中科院地质所稀有元素研究工作,过去定的是10年目标。科技跃进后,由于组织了10个突击队,结果10年工作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2]1958年7月,中科院

党组会议召开期间,有43个单位向会议献礼,共有927项,其中102项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应用物理研究所,他们在大会第一天献礼22项以后,又苦干了三天三夜,在大会闭幕时又再次献礼45项,其中17项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3]有的技术人员竟在报纸上说:“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异想’就能‘天开’。”类似的浮夸在报刊上随处可见,与亩产万斤的“卫星”如出一辙。9月25日,中国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开展建国十周年科学技术献礼运动的决议”,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紧密围绕当前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等中心任务和国防建设的要求,在科技发明创造方面作出贡献,以促进生产和科技跃进。此后,科技界献礼成风,进一步助长了浮夸风。9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祖国科学以划时代速度前进》一文,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科技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不久将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九个月来科技大跃进中的奇迹,使人们充满了这个信念。”

此外,科技界还为工农业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来明辨真相。如对于亩产万斤粮,科学院有人竟证明其可信性,说如果按太阳能输送到地表的能量计算每平方米转化率,每亩打几千斤、上万斤是可能的。再如于光远向毛泽东汇报全国科技情况时,讲了山东农民把苹果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与南瓜一起长。^[4]在不讲科学的年代,科学界的领导都对此深信不疑。何况平民乎?

除了浮夸外,科技跃进政策还表现在科研机构膨胀方面。科研机构贪多求快,中科院各分院草率建立,农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林业科学院等中央科研组织以及各工业部门所属的大批研究院、所都急速建立起来,省和各县的科技协会和科普协会也迅速建立起来。在跃进的口号下,中国科技大学短短3个月时间就从无到有的建立了。这些研究机构,大多匆匆上马,缺乏厚实的基础。最后,瞎指挥也属于科技跃进的表现。比如在大办原子能和加速器的口号下,中科院成立了7个研究所,调动了大批人力,最后勉强存在了1个;以超声波管道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后来也是一无所获。

三、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

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和成都会议上多次提到“技术革命”,但同时又把技术革命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群众运动是破除迷信、发扬敢说敢想敢干精神的好方法,群众的积极性

起来了,每天都有新的创造,技术革命就指日可待了。5月,聂荣臻发表了《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文章。从此以后,群众性的技术革命成为科技大跃进的一大特点。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党提出了“全国大办科学事业,全民学习科学技术”的口号,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于是,各级科研机构开始广泛吸收“土专家”、老农、老工人和技术革新者等做研究员,把工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打破学院式研究,为生产服务。而正规的研究员要到生产中去“补课”,到劳动中锻炼。比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就抽调2/3的研究人员,组成6个农业工作队下乡上山。《人民日报》发表了《向工农科学家学习》的社论。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应该成为科技的主人……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对于事物的各种现象和规律有着深切的体会,一旦砍掉自卑感,破除对科学高不可攀的迷信,就会如原子核爆破一样,发出万丈光芒。”

经济上的危机在大跃进刚迈出第一步时就出现了,于是有了初步纠“左”。但是,科技领域却没有出现困难的迹象。因此,科技大跃进的进程中并没有出现中断。1959年以后,科技领域仍是“跃进”的声音,这与经济领域的纠偏没有同步。但是,此时的科技跃进也有变化,那就是浮夸和贪多求快少了,技术革命的声浪却较以前更为高涨。196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道路继续跃进》的社论。社论指出,现在技术革新运动已经席卷全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全民运动。革新成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需要,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愉快的劳动。此后,直至1960年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深入开展技术革命,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这一时期,专业科研院所实行“技术上门”活动,组织“考察团”、“先进技术推广队”、“青年突击队”、“技术会诊队”等,下到基层去总结先进经验和技能,普及科学知识。广大工农群众革新热情不减,工人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经过群众和专家的努力,的确取得了若干成果,尤其是过去因为人力不足而停滞不前的工作。比如土壤普查、野生植物的调查、血吸虫病的防治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上海沪光科学仪器厂工人王鹤林,经过300多次试验,初中文化的他制成1万伏高压电桥。类似的新发明新创造在当时是很多的。党于是更加相信,在我国科学落后的国情下,光靠专门科学机构和少数专家是不行的,那就决不能使科学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科学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是高速发展我国科学事

业的根本保证。

四、结论

科技“大跃进”始于1958年初,延续至1960年末。这一期间,科技跃进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像工农业“跃进”一样有个初步纠“左”的时段。科技跃进的政策是一个综合概念,包含有以下内容:思想跃进是科技跃进的前提;科技发展中的浮夸和献礼;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闹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在我国一穷二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党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科技事业,采取了超常的跃进政策。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政策,给我国科学事业造成了很大危害。

首先,思想跃进采取了政治运动的方式,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和群众运动的形式,严重破坏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白专”,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深受压抑,不敢说话,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技工作者每周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体力劳动,业务荒废,许多科研项目被迫中断。结果是思想上的“跃进”导致了科研工作的“跃退”。

其次,科技界的浮夸和献礼,严重违背了科学规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最终损害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也败坏了严谨求实的科研风气。

最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某些领域,如地质探矿、气象预报、地震测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许多项目是表面轰轰烈烈,一哄而起,实际上收效甚微。一般说来,在科学活动中大搞群众运动,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活动是循序渐进的。一项发现往往积几年、几十年呕心沥血的劳动才能成功。光凭“人海”战术是无济于事的。科技活动不但需要一时的英勇气概,而且更需要持久顽强的献身精神。无视专家意见和科学规律,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代替严密的科学实验,用群众运动代替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最后只能是妨碍科学的发展。

[1]《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人民日报》1958年3月23日社论。

[2]《人民日报》1958年10月9日。

[3]《科学通报》1958年第15期,第449页。

[4]《张劲夫、杜润生、于光远等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 北京100091)

【责任编辑 王锦辉】